

《桥头瞭望》的戏剧空间建构及其伦理表达

何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空间的伦理性为发现和理解文学中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来看,阿瑟·米勒的戏剧《桥头瞭望》通过语言、动作和舞台布景等方式建构戏剧的社会空间、家庭空间和心理空间,反映了居于美国中下层的意大利移民所面临的伦理两难、伦理身份的混乱和内心无意识的禁忌情感,打破了戏剧的“第四面墙”,在演员与观众构成的交往空间中直接进行伦理教诲,启发人们关注现实社会中伦理准则之间的冲突以及禁忌情感的潜在力量。

【关键词】阿瑟·米勒;《桥头瞭望》;空间建构;伦理表达;文学伦理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20)04-0095-07

阿瑟·米勒(1919—2005)与尤金·奥尼尔和田纳西·威廉斯并称“20世纪美国戏剧三大家”。他以社会问题剧闻名美国当代剧坛,始终关注美国社会中下层普通民众的悲剧命运,强调戏剧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诲作用,被评论界冠以“美国戏剧的良心”的誉称。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指出的,阿瑟·米勒“走的是易卜生的路子”^{[1]364}。《桥头瞭望》(1955)延续了易卜生社会写实剧的传统,聚焦20世纪50年代美国纽约的非法移民问题。此外,它还具有明显的古希腊戏剧的特征,是“一部用希腊古典戏剧意识创作的戏剧作品”^{[2]12}。在米勒的剧作中,《桥头瞭望》受关注度并不高,国内研究非常少;国外学者主要对戏剧的悲剧性进行了探讨,一些批评家涉及了地域主题,但并未进一步发掘戏剧空间背后的伦理表达。

空间具有伦理性,它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人在一定的空间中

收稿日期:2019-11-24

作者简介:何敏(1995—),女,江西宜春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展开活动,受到空间的影响,又反过来赋予空间符号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空间必然会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出规范和反映,其中也必然暗含伦理的内容。空间伦理强调“以伦理性的视角和伦理性的意识来反观各类空间问题”^[3],文学伦理学批评同样指出“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4]13}。空间的伦理性为进一步理解和发现文学中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本文旨在通过文学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探究《桥头瞭望》是如何通过空间建构来揭示戏剧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伦理困境,并达到伦理教诲的目的。

一、社会空间:部族伦理与法律伦理的两难冲突

戏剧作为剧场上的艺术,既有根据戏剧文本搭建的物理舞台空间,也有通过对话和动作等方式塑造的想象性的虚拟空间。这些空间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现实世界,而是“人类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空间关系以及维系这些关系所形成的图像”^{[5]97}。戏剧空间是社会空间的反映。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社会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它产生于社会生产关系并体现了财产关系,“空间的层级和社会阶级相互对应”^{[6]50}。《桥头瞭望》中的纽约意大利移民社区和曼哈顿地区之间不仅体现了文化、经济和阶层的差异,背后还蕴含着深层的伦理冲突。

《桥头瞭望》涉及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空间,戏剧的名字揭示了这两个空间之间的联系,它们分别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大桥的两端。一端是大桥旁的雷德胡克街区,一个面对海滩的贫民窟,这也是一个意大利移民区。米勒在童年时期曾居住在附近,这是“一个充满了黑帮的工会、暗杀、殴打,夜间将尸体扔进可爱海湾的险恶的海滨世界”^{[7]146}。大桥另一端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曼哈顿岛,它与意大利社区截然不同,华尔街、百老汇和市政厅暗示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地位。阶级的空间分层从布鲁克林大桥两端的景象中反映出来。布鲁克林大桥不仅跨越了不同的社会空间,还“成了不同文明之间跨度的象征”^{[2]109},即意大利西西里岛传统文明和美国律法文明之间的跨越。不同的社会空间有着各自的伦理关系和伦理准则。《桥头瞭望》中以部族伦理准则维系的意大利社区空间和以法律伦理维系的曼哈顿地区形成了内在的伦理冲突。剧中涉及的非法移民行为符合社区内部部族准则但违背法律规定,二者不可兼容。

这种悖论性的伦理矛盾致使戏剧主人公埃迪陷入了伦理两难的境地。在部族伦理准则和法律伦理相对抗的冲突中,埃迪做出了前后不同的伦理选择。在第一次伦理选择中,埃迪遵循了社区的伦理准则。他是美国第二代意大利移民,同妻子贝特丽丝和外甥女凯瑟琳居住在意大利移民社区中,也在意大利码头工会工作。社区延续了意大利民族从古罗马文明中传承的部族精神,亲属和家庭关系稳定,社区成员之间密切联系,并且遵守不成文的互助、忠诚的部族社区准则。码头上的意大利工会则帮助移民通过非法的方式来到美国,安排工作并从中获利。可见,这并不是一个以法律主导的世界,它有着自己的既定准则,这些准则比法律更重要,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戏剧中,贝特丽丝的表弟马可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其中一个患有严重的肺病。马可离开家庭、忍受孤独、冒着法律危险背井离乡与弟弟卢道夫一同来到纽约寻求一份工作,以养活自己和孩子,他的遭遇无疑令人同情。埃迪同意收留他们,是道德的也是遵守意大利西西里的

家庭和社区中倡导的忠诚、友爱、互助准则的。但这种行为无疑违反了布鲁克林大桥另一端的曼哈顿地区所代表的法律伦理。这种法律伦理不仅由曼哈顿市政府制定,还通过戏剧中无处不在的移民警察保证实施,正如福柯指出的,“‘警察’意指一个统领理性的纲领。这可能是一个一般性的引导不同个体的法律体系”^{[8]3}。无处不在的移民警察处在埃迪生活的空间中,警示着他法律纲领的存在,以及其行为的违法性。

在第二次伦理选择中,埃迪背叛了自己所处的意大利社区的伦理准则。他自认为卢道夫是一个同性恋并且想要通过娶自己外甥女的方式获得合法留在美国的身份,成为美国公民。出于保护凯瑟琳的目的,他向警察告发了马可和卢道夫,成了自己所不齿的卑鄙的告密者。在意大利社区的伦理准则下,埃迪的行为无疑是不道德的;但在法律伦理上,他的行为是正确的。这种法律伦理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对马可和卢道夫而言显得残忍;另一方面,它维护的是美国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公民权利,是另一种道德要求的体现。

伦理两难的困境使埃迪走向了毁灭,前后两次伦理选择都有其合理性。在看似无法解决的伦理悖论中,米勒通过进一步将埃迪和马可的冲突放置于街道这样一个公共社区空间来表现埃迪毁灭的不可避免。街道是一个十分具有意大利文化特征的空间,对意大利人来说“街道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只是为了交通,还是作为社区存在的”^{[9]29},它与埃迪的社会身份和人格尊严密切联系。马可在街道上当着全体邻居的面咒骂埃迪行为的不道德,他欺负了自己的弟弟卢道夫,抢劫了自己的孩子。埃迪的告密行为被公之于众,他丢失了自己在社区中的脸面。他向马可要他的名声和尊严,试图为自己的尊严而战,最终却被马可夺过匕首反杀。马可充当了意大利部族准则的维护者,对埃迪进行了惩罚。伦理两难的困境最终通过死亡化解。

米勒并没有在戏剧中明确指出《桥头瞭望》的伦理取向,部族伦理和法律伦理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而是通过不同社会空间中相矛盾的伦理准则反映了戏剧人物的伦理困境。《桥头瞭望》更多地提供了一种道德警示,致使埃迪走向悲剧命运的是曼哈顿地区所代表的法律伦理与移民社区道德、友爱、互助伦理准则之间的两难冲突,它既是一个现实的移民问题,也是一个充满着矛盾、难以两全的伦理问题。法律伦理和部族伦理的道德性都是有限的。

二、家庭空间:伦理身份的混乱

《桥头瞭望》的家庭空间与物理的舞台空间重合,体现在戏剧舞台的布景、道具、灯光等方面。但“它的运作方式本质上是符号性的,或者在极端情况下是模仿性的”^{[5]119}。舞台上的家庭空间具有符号性,作为戏剧文本得以展开的空间维度,其既是人物活动的场所,也指向了戏剧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关系背后的伦理问题。

在舞台布景中,《桥头瞭望》的家庭空间是位于雷德胡克街区的一间底层小公寓。厨房、卧室和起居室的框架以及屋内的椅子、餐桌、留声机、灯光构成了整体的空间结构,也与人物的伦理身份密切相关。埃迪作为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支付分租公寓的租金,对整个家庭空间拥有高度的话语权,他既是贝特丽丝的丈夫也是抚养外甥女凯瑟琳的“父亲”。贝特丽丝作为家庭主妇,从来没有外出工作过,与外界接触甚少,她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厨房,代表了埃迪的妻子、凯瑟琳的“母亲”和女主人身份。而外甥女凯瑟琳在埃迪的保护中长大,很少出门,除了偶

尔在厨房帮忙外,长时间待在自己的卧室中,是家庭中的“女儿”。

空间关系揭示了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埃迪对家庭空间的话语权正是他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和父亲的伦理身份的体现,是其夫权和父权的象征。但在看似正常的伦理关系中却隐含着伦理身份危机,埃迪并未能把握丈夫和父亲双重伦理身份之间的界限,造成了自身伦理身份的混乱。他与凯瑟琳超出了正常的父女关系,亲密程度远远大于埃迪和妻子贝特丽丝。他严格限制凯瑟琳的外出,享受与凯瑟琳的身体接触,敌视她身边出现的男性。当凯瑟琳想要接受待遇优越的工作时,埃迪也因担心她之后会彻底离开自己而不愿意答应。而埃迪与妻子贝特丽丝之间却十分疏远,两人并不亲密,极少拥抱和肢体接触,已经三个月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埃迪本应该表现在妻子贝特丽丝身上的性欲出现在他的外甥女凯瑟琳身上。对埃迪而言,他既认为自己是凯瑟琳的父亲,也默认自己是凯瑟琳的丈夫。

随着戏剧的进一步发展,埃迪伦理身份的混乱伴随家庭空间权威的瓦解而更加清晰地暴露出来,导致他不断走向自我毁灭。作为埃迪掌控的家庭空间的“闯入者”,马可和卢道夫的借住需要埃迪的同意,这就意味着必须承认和服从埃迪在家庭空间中的权威,而卢道夫与凯瑟琳的恋爱不仅挑战了埃迪的父权,也是对他夫权的挑战。他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伦理身份,而将凯瑟琳看作是自己的所有物,认为卢道夫企图拐走自己的外甥女无异于在他家中打劫,无法忍受凯瑟琳与卢道夫的正常恋爱。在戏剧第一幕的末尾,米勒通过两场针锋相对的隐喻暗斗直接揭示了埃迪权威的瓦解。他企图通过拳击的方式挑衅和警告卢道夫远离凯瑟琳,但之后,马可和埃迪举凳子的较量暗示了埃迪挑衅和警告行为的无力。

米勒还将埃迪在混乱的伦理身份作用下不断走向毁灭的过程与凯瑟琳摆脱家庭空间的过程同步。工作机会是凯瑟琳走向家外空间的第一步,而随后卢道夫的到来则使她走向性意识的成熟和对埃迪父权和夫权的反抗,逐渐摆脱埃迪掌控的家庭空间。在第二幕中,凯瑟琳在卧室中与卢道夫发生了关系。卧室是凯瑟琳的主要活动场所,本身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在戏剧中还表现为强烈的性隐喻色彩。这激怒了埃迪,促使他将卢道夫赶出了公寓。而当凯瑟琳决定同卢道夫结婚离开公寓的时候,埃迪走投无路地选择了向移民局举报,激化了部族伦理与法律伦理之间的冲突,他的挽救行为反而将自己推向了毁灭的深渊。戏剧中埃迪伦理身份的混乱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获得解决,家庭空间所代表的埃迪的夫权和父权也走向了终点。

三、心理空间:无意识的禁忌情感

戏剧人物生活的世界通过舞台布景以及戏剧语言、动作实现了空间化。于贝斯菲尔德认为:“舞台空间也可表现为一个广阔的心理场,其中各种力量相互冲突,这时舞台空间便成为可以与一个其中破碎、割裂的自我的所有成分相互冲突的封闭场相提并论。”^{[5]105} 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同样指出了空间在反映人内心上的作用,他认为:“卧室和家宅是心理学的图解,他们引导作家和诗人对内心空间进行分析。”^{[10]39} 可见,《桥头瞭望》在建构社会和家庭等外在空间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心理空间。

戏剧中通往上层的楼梯布景隐喻了埃迪心理空间的存在。家庭空间中伦理身份的混乱则指向了埃迪内心的禁忌情感。除了舞台布景外,戏剧人物的行为动作直接使其心理空间外化。

在《桥头瞭望》的第二幕中,醉酒后的埃迪第一次明确暴露出自己对凯瑟琳的欲望。他在争吵中将凯瑟琳搂在怀里,亲吻了她。

禁忌情感造成了埃迪心理空间的伦理混乱。它是促使埃迪伦理选择转变的重要原因,也是促使埃迪走向毁灭的推动力。埃迪否认自己对凯瑟琳超出父爱的欲望,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是正确的,是出自“父亲”保护女儿的目的。这种无知和无意识是现代社会的伦理禁忌约束下的体现,当贝特丽丝和阿尔弗利纷纷警告埃迪对凯瑟琳的欲望时,埃迪采取了逃避的方式,他无法真正认清自己,也无法抵抗禁忌情感的力量。

克里斯多佛·比格斯认为这种性欲潜藏于被希腊侵略和殖民过的遥远的意大利文明中,是古老神话、情感以及禁忌的体现并通过无意识对埃迪产生巨大的影响^[11]。正如米勒所言《桥头瞭望》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并且是一个在当下不断发生的故事”^{[12]262},它由米勒从一个意大利裔的美籍码头工人的口中得知并改编上演。米勒汲取了古希腊心理戏剧的传统,埃迪心理空间中无意识的禁忌情感促使其违背了自己对部族社区伦理准则的信仰。埃迪的悲剧性在于他从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他“采取的强制措施不亚于希腊戏剧英雄的绝对性和补救性”^{[11]206}。

《桥头瞭望》是一部现代悲剧,它最初的名字便是《意大利悲剧》。米勒发掘了社会现实中无意识的心理因素,揭示了古希腊禁忌情感在现代社会中对人的影响。《桥头瞭望》奏响了古希腊悲剧的伦理禁忌主题,但它并不是一出命运悲剧,而是社会和性格的双重悲剧。

四、交往空间:打破“第四面墙”的伦理教诲

胡妙胜认为,在戏剧演出中存在“以包括演员与观众在内的戏剧参与者为中心的空间”^{[13]32},即一种演员与观众共同形成的交往空间。在《桥头瞭望》中,米勒创造性地使用了古希腊戏剧中歌队的表演形式,打破了传统戏剧叙事存在的“第四面墙”,将戏剧舞台变成了现实与虚构共存的交往空间,演员对观众直接进行伦理教诲。这也是米勒在戏剧创作中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他思想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希腊戏剧在希腊城邦文化中所发挥的社会和仪式功能”^{[2]11}。

歌队作为古希腊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酒神祭祀庆典中的唱和,一般由多人组成,其不仅调节戏剧节奏、设定戏剧情绪、担任戏剧角色,更重要的作用是“建构事件的伦理和社会框架”^{[14]26},为观众提供是非判断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强调将歌队看作是一个与戏剧紧密联系的演员,参与戏剧活动。《桥头瞭望》中意大利裔律师阿尔弗利一人充当了整个歌队的角色,米勒将其塑造为戏剧叙述者、参与者、观察者与评价者的统一体。他直接对观众进行叙述,将观众称呼为“您”,这使得观众和舞台上演出的戏剧之间的“第四面墙”消失,阿尔弗利与舞台下的观众形成了一个直接的交往空间。

在交往空间中,阿尔弗利对观众的伦理教诲同样是通过其歌队的角色身份完成的,他参与情节、表达观点、做出评价都是具有伦理教诲意义的。作为戏剧的角色,阿尔弗利既处于戏剧发生的时空,也处在与观众直接交流的交往空间中。因此,他的认识对观众而言更具有信服力,并使他们摆脱沉浸式的戏剧体验,而在其引导下进行伦理思考。他在开场时与观众的直接交谈不仅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还建构了戏剧的社会空间,指出这个空间贫穷、落后、野蛮的基

本情况。而其本身就如同连接雷德胡克区与曼哈顿岛的布鲁克林大桥一样,象征着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阿尔弗利是一位意大利移民的儿子,也是一位熟知美国法律的律师,他不仅通过法律为雷德胡克这个意大利社区中的移民维权,还试图向埃迪和马可解释美国社会的法律。正是这样一种身份,使他能够对部族伦理与法律伦理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传达给观众。

另外,阿尔弗利的行动和观点暗含伦理价值指向。当埃迪试图寻求法律的帮助使卢道夫远离凯瑟琳的时候,阿尔弗利指出了马可和卢道夫进入美国的非法性以及埃迪对凯瑟琳情感的越界,忠告埃迪不要干涉凯瑟琳和卢道夫之间的感情。埃迪的收留行为违背了美国的律法伦理,而其情感也违背了正常的亲属伦理关系。阿尔弗利也是戏剧的观察者,他观察埃迪的生活和内心,对观众讲述埃迪码头生活的艰苦,在几次旁白中将埃迪称之为“他”。阿尔弗利看到了埃迪在伦理冲突和伦理混乱影响下走向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性:“我知道他在朝什么方向走去,我也知道他会在什么地方終了。好几个下午我坐在这里扪心自问,像我这样一个聪明人,为什么竟然毫无能力去制止这件事。”^{[15]366}

更为重要的是,阿尔弗利引导观众正确地看待戏剧中埃迪所面临的伦理困境。苏珊·艾博森认为:“阿尔弗利代表的是法律,而不是正义,米勒小心地不把这些条款混为一谈。”^{[16]342}这种说法不够全面,在伦理两难的困境中,并不存在纯粹的正义。作为连接两种文明的桥梁象征,阿尔弗利深知两种文明中各自的伦理准则存在的不足,法律显得不近人情,也不会对埃迪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惩罚,他告诉马可法律并不意味着赏罚公正,“只有上帝赏罚公正”^{[15]403}。此外,意大利部族准则既无视法律也具有野蛮血腥的特征。法律既没有帮助马可惩戒埃迪的告密行为,也无法帮助埃迪解决他的困境。符合部族伦理准则的道德行为可能是违反法律伦理的,符合法律伦理的行为也可能是违背部族伦理准则的,二者之间存在着鸿沟。阿尔弗利不仅指出了法律伦理和部族伦理准则的片面性,还试图告诉观众埃迪无法意识到自身禁忌情感的悲剧性。埃迪既面对着伦理两难的社会现实处境,又遭受了无意识的性禁忌欲望的影响。阿尔弗利赞同埃迪犯错而受到的惩罚,也对他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试图通过埃迪的悲剧启发人们关注社会现实中伦理准则之间的冲突以及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古老的禁忌因素,对社会和自我的内心世界进行审视。

五、结语

米勒在《桥头瞭望》中巧妙地运用了戏剧空间的符号性和伦理性,通过语言、动作和舞台布景等方式建构戏剧的社会空间、家庭空间、心理空间及交往空间,揭示了不同空间中的伦理准则、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对观众进行伦理教诲。剧作家实践了古希腊戏剧的形式和功能,在伦理冲突、伦理混乱和伦理禁忌的空间中真实地再现了美国中下层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困境。作为一部心理现实主义戏剧,《桥头瞭望》的空间建构是对现实的模仿和心理的深入挖掘。米勒旨在通过戏剧空间中的伦理问题使人们对法律、道德和自我进行重新审视。正如凯拉什·钱德指出的《桥头瞭望》是一部“深刻而令人不安的悲剧”^{[16]344},它直指那些人们在生活中易忽视的社会现实和无意识的内心自我。

参考文献:

- [1] 哈罗德·布鲁姆. 剧作家与戏剧[M]. 刘志刚,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 [2] MURPHY B, BIGSBY C, WERTHEIM A, et a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thur Miller[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 吴红涛. 空间伦理: 问题、范畴与方法[J]. 深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58-64.
- [4]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5] UBERSFELD A. Reading theatre[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 [6]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 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M]//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7] ARTHUR M. Timebends: a life[M]. London: Methuen, 1987.
- [8] 米歇尔·福柯. 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M]//包亚明.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9] 芦原义信. 街道的美学[M]. 尹培桐,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10] 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11] BIGSBY C. Arthur Miller: a critical stud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2] ROUDANÉ C. Conversations with Arthur Miller[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7.
- [13] 胡妙胜. 戏剧空间结构——舞台设计的美学[J]. 戏剧艺术, 1988(4): 18-34.
- [14] 奥斯卡·布罗凯特, 弗兰克林·希尔蒂. 世界戏剧史[M]. 周靖波,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15] 阿瑟·米勒. 外国当代剧作选(4)[M]. 梅绍武, 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
- [16] ABBOTSON W. Critical companion to Arthur Miller: a literary 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work[M].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07.

责任编辑: 罗清恋, 穆刚

The Construction of Theater Space and Its Ethical Expressions of *A View from the Bridge*

HE M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ethical nature of spac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discover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ethical issues i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rthur Miller's theater *A View from the Bridge* constructs the social space, domestic space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of theater by means of language, action and stage setting, reflecting the ethical dilemmas, the confusion of ethical identity and inner unconscious taboo emotion of middle and lower Italian immigrants. It breaks the "fourth wall" of theater and teaches ethics directly in the spac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actors and audiences, inspiring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thical norms in real society and the potential power of taboo emotion.

Key words: Arthur Miller; *A View from the Bridge*; spatial construction; ethical expressi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